

深謀遠慮奠磐基

朱家驊與中央研究院（一）

● 陶英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暨胡適紀念館主任）

前 言

朱家驊（驢先）先生，光緒十九年癸巳四月十五日（一八九三年五月三十日）生於浙江省吳興縣。光緒十九年為民前十九年，（故總統府資政朱公驢先先生墓誌銘）及（傳略）、事略均誤作民前十八年。

今年農曆四月十五日為陽曆五月十八日，是他一〇八歲冥誕。中央研究院對於已故世的院長，照例在其生日時舉行紀念演講會，藉表懷念之意。朱院長因在台灣大學設有獎學金，所以其生日演講會，向由中研院與台灣大學合辦，同時頒發獎學金給地質系及地質研究所的績優學生。起初將日期定在農曆生日那天，所以每年都要換算成陽曆，相當麻煩；自民國七十五

年起，乃與台大商定在每年陽曆的五月三十日舉行。

對中研院貢獻良多

中研院所以與台大合辦朱先生的生日演講會，照錢思亮院長在（朱驢先先生八十冥誕致詞）中的說法：

民國三十七年冬天，大陸軍事緊急的時候，朱先生正在主持教育部，他「看到台灣大學就要成為戡亂時期的教育重鎮，並且為準備安頓大陸撤離來台的學人起見，適時的呈奉總統核准，請傳（斯年）先生來主持這所學校，這一個措施實在很有深遠意義的。台灣大學由於朱先生的明智安排，得在傅先生的領導之下，迅速邁進穩定進步的大道。所以，台灣大學共同來紀念朱先生，是和中央研究院同樣的具有

深切意義的。」

朱先生為台大物色了一位好校長——傅斯年先生，而錢思亮先生係繼傅先生為台大校長、並為中研院第五任的院長，他這段話，是親身的體會，所以特別中肯。

國立中央大學及國立中央大學學術基金會也來聯合舉行紀念演講會，共同追懷朱先生，那是因為朱先生於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四日接任中大校長的關係。其任校長雖然只有短短一年的時間，即調任教育部長，但是由於他的知人善任，也為中大物色了一位好校長——羅家倫（志希）先生。當時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受不了外侮的刺激，學潮迭起，而首都為尤甚，中大也陷入了不安定狀態。

自從羅先生出任校長後，朱先生在教育部全力支持，不僅使中大迅即恢復了常

態，並不斷的進步和發展；及抗戰爆發，在日軍飛機的轟炸下，又全部遷到重慶沙坪壩。後來朱先生常對朋友們說：「我逼志希擔任中大校長，苦了志希，救了中大。」這兩位老校長對中大的關懷、支持和貢獻，至今仍然一直為中大的師生所感念！

余生也晚，在朱院長逝世一年半後，即民國五十三年七月一日才到中研院服務。今天在座的許多位前輩，如萬紹章先生、方志懋先生等，曾追隨朱先生多年，承蒙惠賜很多珍貴資料，至為感謝！這次臨時受命報告朱先生與中研院的關係，深感榮幸，也非常惶恐！既不容推辭，惟有勉力而為，敬請諸位前輩多予指教。

朱先生以學者從政，歷任黨政方面的要職。他一生對國家社會之豐碩貢獻，實為近代史上所僅見。他雖曾擔當過多方面的繁重任務，但與中研院的關係，竟連續長達三十多年之久，由擔任地質調查所籌備委員、評議會評議員、總幹事，並於蔡元培院長逝世後，繼任為代理院長。抗戰勝利後，中研院的復員以及播遷來台的重建與發展，都是朱先生對中研院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

參與籌備夙夜匪懈

民國十六年五月九日，中央政治會議第九十次會議，議決設立中央研究院籌備處，並推定蔡元培、李煜瀛、張人傑等六人為籌備委員。

六月，蔡元培又在中央政治會議第一〇二及一〇五次會議中提出組織中華民國大學院，作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至是，籌設之中研院，遂成為大學院中附屬的機關之一。十月，著手籌備。十一月二十日，舉行中研院籌備會及各專門委員會聯合成立大會，討論中研院組織大綱及籌備會進行方法。這時朱先生以廣州第一中山大學副校長的身分，為大學院大學委員會之當然委員，由於中研院尚隸屬於大學院，所以也參與中研院之籌備工作，並被聘為中研院地質調查所籌備委員之一。

徐淵摩為常務委員，翁文灝、李四光、譚湛溪、李濟為委員。（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一九二七—一九四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七期（台北，民國六十七年六月），頁五；《大學院公報》，第一年，第一期（南京，民國十七年一月），頁一五五—一五

六。）」

朱先生為推動對各地方地質調查，曾於十六年五月在廣州籌設兩廣地質調查所，自任所長，是省辦地質調查所規模最大者。十一月十七日，廣州發生「張（發奎）、黃（琪翔）事變」，又有共黨暴動，調查工作大受影響，所中人員陸續離開，葉良輔、謝家榮等即轉至中研院地質調查所任研究員，朱先生亦應聘為通訊研究員。（朱家驊，〈三十年來的中央研究院〉，王聿均、孫斌合編，《朱家驊先生言論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六十六年五月），頁一〇六。）十七年一月，該所更名為地質研究所。

據朱先生說，中研院的外文名稱，就是採用他的建議：

「到了民國十七年初，記不起是那一天，蔡先生在大學院召開了一個談話會，第一次討論到創辦本院的工作。當時參加者除了蔡先生外，尚有吳稚暉、李石曾、褚民誼、楊杏佛諸先生與我共六人，會中文譯名，我提議用拉丁文 Academia Sinica，大家以為此名稱涵義過於廣泛，未作決定，及正式成立時，還是採用了這個名稱

(一) 朱家驊與中央研究院

。「《朱家驊先生言論集》，頁一〇五。討論外文名稱的時間，朱家驊說：「不起是那一天」，茲據《大學院公報》第一年，第三期（民國十七年三月出版），頁七十九—八〇記載，大學委員會於十六年十二月廿四日舉行第三次會議中，第四項議案為「請將大學院及中央研究院譯名正式公布案」，議決：通過。」

此外，評議會的設立，朱先生也曾從旁協助。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丁文江接任中研究院總幹事後，便積極著手籌設評議會，在朱先生的支持下，順利於中央政治會議中通過，國民政府於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頒布「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條例」。據朱先生在《丁文江先生與中央研究院》一文中說：

「他對評議會組織條例的起草，和第一屆評議員的產生方法，與有關方面經過不斷的商討，幾次再審，補充修正，才始完成，真可謂費盡心血。那時我仍在交通部長任內，他顧慮中央不能通過，常常跑到交通部和我往復磋商，我深深為他這種辦事精神所感動。最初我對於評議員只限於中央研究院已有的研究科目，其他學科

的人員並不包括在內，頗有異議。他力勸我不要再堅持，不必再擴大範圍，以免發生其他枝節。他的苦心孤詣，使我終於同意，並在中央政治會議予以支持。」（《朱家驊先生言論集》，頁七四九。）

評議會的成立，是丁文江替中研究院立下了百年大計，僅就決定院長人選一事而言，亦使中研究院有了穩固而比較獨立的基礎。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日，在南京舉行第一屆評議員選舉會，選出聘任評議員三十人，朱先生當選為地質學之評議員。九月七日，正式成立評議會。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首屆評議會第五次年會第四次會議在重慶舉行，選出第二屆聘任評議員三十人，朱先生又當選為地質學之評議員。同年七月，第二屆評議會成立。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中研究院舉行第一次院士會議，選出第三屆聘任評議員三十二人，朱先生時任代理院長，為當然評議員，並任議長。四十七年四月十日，第三次院士會議加選朱先生等五人為第三屆聘任評議員。四十九年春，朱先生再當選為第四屆數理組聘任評議員，直到病逝為止。

繼任中研院總幹事

1. 繼任總幹事與辭職的經過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五日，中研院總幹事丁文江病逝於長沙湘雅醫院。一月十二日，中研院開院務會議，討論丁總幹事故世後追悼、撫卹及紀念等問題，也曾就總幹事繼任人選問題交換意見。據與會之氣象研究所所長竺可楨記云：

「五點，蔡先生討論繼任人選問題。計有翁詠霓（文灝）、任叔永（鴻雋）、胡適之（適）、朱騶先、李潤章（書華）等。余主張詠霓，但孟真（傅斯年）、滌三、寬甫（徐韋曼）諸人皆反對，謂其脾氣太壞，不易合作。孟真主張騶先或適之。子競（周仁）則以為人選應嚴重考慮，不然以異甫（丁燮林）暫代為是。九點半散。」（《竺可楨日記》，第一冊（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頁八。）

總幹事一職，遂暫由物理研究所所長丁燮林兼代。據朱先生在《丁文江與中央研究院》一文中云：

「當時我已離開交通部，蔡子民先生自上海來函要我接任總幹事，一面又請孟真與在京數位所長一再相促，我因脫離學

術研究工作多年，數度婉辭未果，不得已於五月間到院，接替他（丁文江）的工作。」（《朱家驊先生言論集》，頁七四九。）

朱先生實際到任的日期應為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蔡元培在其《日記》（高平叔主編，《蔡元培文集》，卷十四，《日記》（下冊），台北，錦繡出版公司，一九九五年五月出版。）中留有致聘的簡單紀錄：

六月一日「駱先道到京，約一談。欲請任總幹事。」（頁二〇六）

六月十日「獻廷〔中研院文書主任王顯廷〕赴京，攜我致駱先函。」（頁二〇七）

六月十五日「得駱先電，言本日已參加本院在京紀念週，定於十八日來滬晤談。」（頁二〇八）

六月十九日「午前十時，駱先來。午後二時，院中備茶點，集全體同事，歡迎新任總幹事朱駱先。」（頁二〇八）

這時中研院已有十個研究所，分設京滬兩地：物理、化學、工程三研究所設在上海，心理、地質、天文、氣象、歷史語言、社會科學、動植物七研究所設在南京；

行政中心之總辦事處也在南京。蔡院長則避居滬上，另設有駐滬辦事處，很少來京，實際統贊全局的則是總幹事，總幹事是院內實際行政的總樞，可以放手去做，蔡院長只總持大體，不務瑣屑干涉，照傅斯年的說法就是「內閣制」。由此可知總幹事一職在中研院的地位及重要性。

朱先生接任總幹事時，尚兼代中央政治委員會（即前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甫就任總幹事，行政院長蔣中正要調他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朱先生以不便中途引去，數度堅辭，遂未實現。二十五年秋，又命接任浙江省主席，仍懇辭，至十二月二日明令發表，無可再辭。十一日赴滬向蔡院長報告奉命主浙的經過，十六日到杭州接事。對於中研院之院務，勢難兼顧，惟因蔡院長在上海患重病，瀕危者再，不便言辭，又不能不去浙江接事。當他不在南京時，總幹事職務則託史語所所長傅斯年代為照料。直到抗戰發生，院中同仁仍不准他辭總幹事，而蔡院長猶在病中，也不敢讓他知道，怕他煩心。（《朱家驊先生言論集》，頁一〇八。）個中原委，朱先生在《悼亡友傅孟真先生》一文中曾有扼要的記述：

「廿五年春，我應蔡先生之約，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冬間奉命主浙，一再堅辭未果，而勢難兼顧，其時蔡先生又患病在滬，同仁等集議結果，要我暫勿向蔡先生提起，只得勉強拖延下去。雖有時亦分身到院工作，但所有事務，都偏勞孟真代為處理。次年七七之變，淞滬戰事旋起，浙江首當其衝，不能稍離，而京中告急，更無法兼顧院事。在這一年餘之中，院內諸事，無論巨細，悉承孟真照料，甚至全院西遷，也都由他一手辦理。廿七年夏，蔡先生始准我辭。」（《朱家驊先生言論集》，頁七四三。）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蔡院長接朱先生函，辭總幹事，並薦傅斯年以自代。翌日復函勸勿辭。十二月六日，朱先生交卸浙江省政府主席，奉命前往漢口。蔡院長於二十七年一月十三日電朱先生，請即回院視事。朱先生抵漢口後，蔣中正即囑在左右相助，擔任多項要職：參事室主任、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三民主義青年團代書記長、中統局長等，必須隨節駐鄂，不能遠離，公務之繁劇，不可言喻，對於院務，勢不能兼顧，故多次懇辭。二十七年三月三日，蔡院長當面向朱先生

及史語所傅斯年、物理所丁燮林、化學所莊長恭、工程所周仁、氣象所竺可楨、地質所李四光、心理所汪敬熙等所長宣告：「騷先無論到何地，總幹事之名不能取消，仍請孟真代理。」其挽留之誠意，躍然紙上。

後因朱先生仍堅辭，而總辦事處遷渝，史語所遷滇，傅斯年有兩處難以兼顧之感，不僅不肯再代行總幹事職務，並要辭去史語所所長。蔡院長不得已，乃分函各所所長徵詢繼任人選意見，有主張任鴻雋者，也有因為任鴻雋不是評議員，而主張王世杰者。

蔡院長再函請王世杰繼任，王世杰也以公務太忙，連兼任也不可能。乃於十一月九日面請任鴻雋接任總幹事，獲得同意，並於十一月二十九日自香港飛渝就任。朱先生方得擺脫總幹事職務。「高平叔主編，《蔡元培文集》，卷十四，《日記》（下冊），頁三〇三、三二九、三四三、三八四、三八六—四〇九。」

蔡院長所以堅留朱先生擔任總幹事，甚至僅居名義亦可，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他政府在政府工作，有豐沛的人脈，可為中研院爭取經費。

竺可楨在其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日記中即作此看法：

「仲揆〔李四光〕云：騷先決辭職，傅孟真……遂薦三人於蔡先生，即吳政之〔有訓〕、丁巽甫及任叔永。余謂三人均佳，但吳、丁二人素與政府無往來，將來取款不無困難耳。」（《竺可楨日記》，第一冊，頁二六三。）

重要建樹影響深遠

(1) 計畫各研究所集中南京：中研院係國家學院，各研究所理應集中在首都南京；在成立之初，也呈請國民政府將清涼山一帶劃定為院址，唯因南京市政府遲遲未能交付清涼山土地，而國民政府也未撥給建築費，故無法集中辦公，各研究所分散於京滬兩地。民國十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國民政府轉送中央政治會議之決議案，嚴令中研院於四月以前一律移至南京。楊銓（杏佛）總幹事為此曾於十四日之內往返京滬八次，與行政院及國民政府疏通，仍未成功。可是既無土地又無建築費，實在無法集中。「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一九二七—一九四〇〉，頁二四—二八。」

到朱先生接任總幹事後，尚有工程、物理、化學三個研究所設在上海。他覺得南京雞鳴寺山麓北極閣的院址狹小，環境也不適宜，為將上海的三個研究所移至南京集中，便在中山門外勘定了二千畝地皮，作為整個院址。由於購地手續十分複雜，到了二十六年尚未辦妥。旋因抗戰爆發，全院內遷而中止。（《朱家驊先生言論集》，頁一〇八。）

(2) 加強與各研究組織及各大學之關係：近代中國在飽受西方船堅砲利的凌辱以後，不得不急起直追，在用不同的方式去努力發展科學。「五四」以後，學術團體次第成立，各大學亦相繼添設研究部門。在所有從事科學研究的團體中，規模最大而相當完備的，自屬中研院。朱先生到院後，就認為不能只做關門研究，曾說：

「除自身從事研究工作之外，對外應與其他研究組織密切聯繫，並與各大學溝通。至於本身研究工作，也要同時注意培植後進，故開始招收研究生，並設法與各大學、各學術機構進行各種合作。」（朱家驊，〈國立中央研究院簡說〉，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印，《革命文獻》，第五十九輯（民國六十一年六月），頁二

二四。

他又在〈三十年來的中央研究院〉演詞中說：

「依本院規定，院中研究人員，不得在外兼課，俾得專心研究工作。我覺得研究人員，如不在大學教書，則不易明瞭大學情形，尤其不易物色後進，而且當時各大學師資缺乏，本院殊不易羅致許多人才，不與外界聯繫合作。故我接事後，在院務會議提議，依照政府公教人員規定，研究人員，可在各大學兼課四小時以內，並可利用本院設備，招收研究生，自己造就人才。……但各所對此也不甚熱心，故未辦成。」（《朱家驊先生言論集》，頁一〇八。）

現在，中研院之研究人員，仍可在外兼課四小時；惟招收研究生事，因涉及授予學位等問題，至今尚無妥善辦法解決。

(3) 抗戰期間全院不斷的播遷：二十六年七七抗戰發生，中研院即全部西遷。朱先生洞燭機先，早已預作準備：

「從民國二十五年秋天起，中日戰爭風雲日急，我們預料戰爭必將爆發，計劃把本院遷移後方，即作種種準備，地質研究所先將一部分移往廬山，院本身並在長

沙籌設工作站，預備在戰爭發生時，可以應變搬遷。及七七事變發生，我在廬山，蔡先生病體未復，我即趕回南京和同仁商量遷移工作，尤其與傅所長磋商一切，託其照料遷移工作。第一步遷移工作，先將各所集中長沙，除了上海工程理化三所，有部分設備寄存外，各所全部設備和人員都移到長沙集中。」（《朱家驊先生言論集》頁一〇八—一〇九）

當時限於運輸工具及交通之困難，各研究所不得不分程疏散。及長沙危險時，又作第二次疏散。自淞滬戰事後，浙江首當其衝，朱先生為省主席，不能稍離，而京中告急，更無法兼顧院事，皆由傅斯年代為料理。蔡院長於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搭船離滬，二十九日抵香港，因健康關係便一直留在香港，並未隨院西遷。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蔡院長在香港主持院務會議，朱先生及十個研究所所長均到會，決定：

(1) 地質、動植物、心理、社會科學四所，既在桂林、陽朔開始工作，不必再徙昆明。

(2) 氣象所及總辦事處准在重慶，天文所至昆明。

(3) 歷史語言所在昆明，與第一臨時大學合作。

(4) 物理、化學、工程三所之儀器、書籍、雜誌、機器等，遷移較易及適於在內地工作者，遷昆明；其不能遷者，在上海保存。（高平叔主編，《蔡元培文集》，卷十四，《日記》（下冊），頁三四一。）

會議以後，各所乃分向桂林、昆明、重慶三地集中。二十七年十一月，戰線又向西伸。

民國三十三年，日軍並企圖進犯桂林，部分研究所不得不再作第三次或第四次之遷徙。

各研究所之不斷播遷，所需車輛極多，而西南之所有交通運輸工具，都為支援前方軍事而嚴加管制，實難供應，連通行關卡也不容易。至於申請遷移經費，尤多周折。均賴朱先生運用公私關係，協助傅斯年一一解決，使各研究所遷到安全地點，繼續工作。（孫斌，〈朱家驊先生與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第二輯，附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民國六十七年六月），頁二十六。）（未完待續）